

## 中国现代文人与城市公园(1930年前后)

高兴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 1930年前后的国内思潮非常活跃,一大批聚集在城市中的文人在文化立场方面有着诸多差异,各类群体的文人有着不同的城市活动方式,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人(通俗文学作家)等不同类型的文人与城市公园的关系各有千秋,探究文人的城市公共空间意识有助于揭示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和文化语境。

**[关键词]** 现代文人;城市公园;1930年前后

**[中图分类号]** G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2)02-0052-06

在分析文人与城市空间的精神联系方面,本雅明是誉满中外的大师,他“在密谋着策划起义的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发现了文人”,将其归入“波西米亚人”一类和“游手好闲者”的行列,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人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意识<sup>[1]</sup>。本雅明还谈到了文人与巴黎都城的精神关系,他以诗意般的笔调写道:“游手好闲者依然站在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一样。但是两者都还没有压倒他。他在两者中间都不感到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sup>[1]</sup>或许,不断寻找合适的“避难所”正是文人挣扎于人间浮世的宿命。

古往今来,诸如“乘风归去”(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或“躲进小楼”(鲁迅:《自嘲》)之类的诉愿其实都反映了中国文人无所适从的精神苦闷。古代名士尚能借助田园山林中的吟游或舞榭楼台里的畅饮来冲淡内心苦痛,而现代文人为了维持生存却不得不依托于城市,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和利用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呢?本文以1930年前后的中国现代文人与城市公园的关系为例来探究这一问题,并从中揭示那个特殊时代的文人心理和文化语境。

### 一、权利载体:从郑振铎关于对的呼吁谈起

1930年前后的文人对城市公园建设发出的最强劲的呼声出现在郑振铎的《上海之公园问题》一文中,他站在都市人的“呼吸权”、“生存权”的高度说明任何一个都市均有必要建设自己的公园,认为只有到公园里,人们才能“暂时的由事务的人的世界而到自然的世界里转换一下趣味与眼光的”<sup>[2]</sup>。郑振铎还通过比较,说“伦敦的大公园至少在二十个以上”,而上海的公园则“屈指以数”。现将郑振铎在文中所举出的上海公园见表1:

在郑振铎眼里,上海公园的数量太少、质量也

不高,而且就连这五个公园也不是华人都能进去的,他很不平地说“我们只能在墙外望望园里的春色,我们只能在墙外听听园里的谈笑声”,只有“英、美、法、日本诸国人”能进去,而“我们是被放逐于乐园之外了!主人翁被放逐出自己的公园之外了”<sup>[2]</sup>!最后,郑振铎号召大家为了捍卫权利而“热烈的持久的举行着‘公园运动’”<sup>[2]</sup>。该文充分体现了郑振铎开明、正直的文化立场。

表1 郑振铎列出的上海公园分布

编号	位置	名称
一	中部	白渡桥小公园
二	西部	极司非路公园
三	北部	儿童公园
四	西南部	法国公园
五	北部	虹口公园
六	极南部	半淞园

事实上,在郑振铎列出的“公园”名单中,半淞园属于私人园林(也称为“私人花园”)而不属于现代城市公园,这种私人花园(园林)“以私人居家性质者为数最多,园地大概均不广大,而结构则颇精致,有长年开放,定期开放及不开放三种,如有人介绍,则不开放者亦得入内,不售门票。……私人花园不比公园,即使开放,仍有多数保留主人自用之处”<sup>[3]</sup>。在上海,这种私人花园还有豫园、徐园、沈家园、爱俪园等多处。另外,郑振铎统计的那“五个公园”只是上海最主要的公园而已,其中他所说的“中部”的“白渡桥小公园”、“西部”的“极司非路公园”、“北部”的“儿童公园”、“西南部”的“法国花园”应该分别指外滩公园、兆丰公园(又称极司非尔公园、梵王渡公园)、昆山花园、法国公园(又称顾家宅公园),对照有关史料记载,郑振铎关于“法国花园”即法国公园在上海西南部

**[收稿日期]** 2011-12-18

**[作者简介]** 高兴(1978-),男,安徽枞阳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文化。

的“龙华路上”的说法似乎有误，因为历史上的法国公园（顾家宅公园）应当在法租界的“华龙路”（今雁荡路）上而不是“龙华路”上，是郑振铎的笔误还是编辑者的失误？这就不得而知了。除了郑振铎所说的“五个公园”以外，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公园还有汇山公园、华人公园、凡尔登公园、宝昌公园等。当然，就公共租界而言，外滩公园、兆丰公园、虹口公园这三个公园较有名声，它们合称为“公共租界三公园”。

郑振铎后来也许会感到一些欣慰，因为从1928年6月1日起，公共租界的昆山花园、虹口公园、兆丰公园（极司非尔公园）、外滩公园一律开放<sup>[4]</sup>；随着1928年6月18日法租界的公园新章程的起草完毕，“华人从此始得以一元的代价，享受常年游玩法国公园的幸福”<sup>[5]</sup>。从此，沪上公园的游客数量大为增加，以下是“公共租界三公园”在1932年12月和1933年1—6月的游客数量统计见表2：

表2 游客数量统计表（1932年—1933年）

名称	地点	游园人数	
		1932年12月	1933年1-6月
兆丰公园	愚园路底曹家渡	30275人	552935人
虹口公园	北四川路	15431人	266269人
外滩公园	外白渡桥畔	11066人	54542人

（说明：表中数据来自1933年1月10日《申报》上的《工部局各公园游人数目》和1933年7月16日《申报》上的《工部局各公园六个月游人数目可惊》。）

法租界的法国公园（顾家宅公园）的游客人数未列入以上统计表，但从现有的文字记录来看，法国公园也应当是游人群集、热闹异常的地方，《申报》上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如《法公园法国纪念节之盛况》（1928年7月18日）、《法公园盛会随记》（1928年7月24日）、《顾家宅公园所见》（1928年8月13日）、《纪法国公园之游》（1929年9月11日）等等，这些文章描述了法国公园里游人摩肩接踵的场景，或者提到了众多青年男女在法国公园里谈情说爱的现象。在游览公园的人山人海，又怎么会少掉文人的身影？

## 二、都市“乐园”：海派文人和通俗文学作家的公园体验

公园对海派文人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力，这个现象也不难理解，因为倾心于现代生活和浪漫情调正是海派文人的显著特色。1930年，章衣萍在信中说

自己“每天一早就到虹口公园去”<sup>[6]</sup>，“在上海的唯一的娱乐是逛虹口公园。……对着绿水凝思：有时心若太空浮云，飘渺无际，有时心若秋风夜雨，愁思丛生”<sup>[6]</sup>，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城市公园对于海派文人的莫大意义一既是他们的“乐园”又是他们回避时代风雨的“避难所”。张若谷留下的文字记录也表明他在工作之余常去逛法国公园<sup>[7]</sup>。《法公园之夜》（1931年）的作者曾今可对于公园更是情有独钟，他自称在法国公园里看见巴金阅读《法公园之夜》，还幽默地劝他再写一篇《法公园之黄昏》<sup>[8]</sup>。曾今可写过一首以《法公园一瞥》为题的诗歌，声称“随便在街上走”结果就“走到法公园门口”<sup>[9]</sup>，而他的《法公园之夜》（再版）广告文辞颇有吸引力：

上海的法国公园，是一个使无数的少男少女沉醉的胜地；在近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学作品中，已有着不少以法公园为背景为题材的了；本书独注意到描写夜的景色，可以说是一种创格。凡是夜游过法公园的人，读了定能勾引起许多的甜蜜的回忆；没有夜游过法公园的人更不能不读，你读了便如身历其境一般<sup>[10]</sup>。

海派文人在作品中摹写公园美景或以公园作为故事背景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1930年前后，有关兆丰公园（极司非尔公园、梵王渡公园）的作品有张资平的《爱之涡流》和《结婚的爱》、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和《在巴黎大戏院前》、林徽音的《出走》等，涉及法国公园的作品还有叶灵凤的《红的天使》、章克标的《蜃楼》、《银蛇》和《岁暮》等，关于虹口公园的作品有张资平的《爱之涡流》和《结婚的爱》、叶灵凤的《第七号女性》、张若谷的《寂寞独奏曲》、章克标的《站在电车上兜风》、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前》等，提及外滩公园的作品有张资平的《群星乱飞》等，不一而足。除此之外，《真美善》杂志上的《偶像的神秘》（第1卷第7号，1928年）、《玩偶少年》（第3卷第6号，1929年）、《公园中的札记》（第6卷第6号，1930年）以及《现代》杂志上的《架上的八个》（第3卷第5期，1933年）均以公园作为故事的空间背景。海派文人的公园描写带有浓郁的诗意，他们常常将温馨浪漫的公园作为两性情爱故事开展的必要场所，或者从中发掘神秘微妙的都市艺术情调。他们偶尔也会借公园美景的抒写来感喟世间的悲凉和沧桑，但在感伤的背后仍然显露其对公园的向往和偏爱。

通俗文学作家也是公园爱好者，受古典文学影响较深的通俗文学作家对于山石草木、花鸟虫鱼十分偏爱，有郑逸梅作他们的代表就已足够。仅在1928年的《紫罗兰》杂志上，郑逸梅先后发表了三篇专

门描写租界公园的文章:《述外滩公园》(第3卷第6期)、《虹口公园纪游》(第3卷第9期)、《夜游法公园记》(第3卷第11期),皆内容详实、描述细致。

《紫罗兰》杂志上除了郑逸梅关于租界公园的详尽介绍之外,范烟桥的《一年容易》(第3卷第8期,1928年)有法国公园的局部描写,胡天农的《热情》(第4卷第11期,1929年)提到了兆丰花园。在《紫罗兰》杂志上,也有通俗文学作家声称上海的“F公园简直可算是造成罪恶的渊藪”,因为里面有很多“不知自重的人”<sup>[11]</sup>。这里的“F公园”很可能指“法国公园”,由此可见,虽然通俗文学作家与海派文人都喜爱观赏租界公园里的自然风物,但他们对于租界公园内的人物活动却有不同的感受,看来这两类文人的文化价值观并非完全重合。

### 三、文化园地:自由主义文人对于京、沪公园的情感差异

在北京活动的自由主义文人经常前往北京鼎鼎有名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游览或聚会。中央公园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桂莘(朱启铃)于1914年发起捐款创办,其布置和建筑都“保持了中国园林的格局,保持了民族形式”,这是它与上海以及国内其他各大城市的公园颇为不同的地方<sup>[12]</sup>。中央公园内有社稷坛及圆明园遗物,在参天的古柏之间又设有茶座和菜馆,是各类社会名流喜爱光顾的好去处。诸多茶座之中,来今雨轩最富盛名,不仅环境别致高雅,而且开设西菜馆,经常去那里的游人当中“大多数是西装革履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也有政府官吏”<sup>[12]</sup>。现代文人和中央公园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自它创建以后,那里曾经出现过《新青年》杂志同人、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文学研究会发起人、《语丝》社社员等多个文化社团的文人身影,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等很多学界精英也常常驻足其间。一些自由主义文人从北京转往上海以后,“洋场”中的西式公园对于他们的吸引力似乎明显减弱了。有研究者考察了1927年的胡适日记,发现北京的中央公园是“胡适在北大生活与活动的重要据点”,“胡适有很多时间消磨在中央公园里”<sup>[13]</sup>，“只有在中央公园才能寻到他自己的生活情趣,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sup>[19]</sup>。但是,从胡适1927年到1930年在上海的日记中却几乎找不到关于公园的记录,仅在1928年3月27日这一天,胡适在日记中说“本想游甘、味两家花园,因时间太晚,不曾去”<sup>[14]</sup>。想不到京、沪两地公园的地位在胡适的生活中竟有如此悬殊。

蔡元培一直看重公园的文化意义,1922年,主持北大的蔡元培论述美育的实施方法时谈到了两种类型的公园,他将北京的中央公园和上海的外滩公园相提并论、归为一类<sup>[15]</sup>。1927年之后蔡元培担任了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等官方职务,1931年他在谈到都市公园的文化意义时,将目光从上海转向了新都“南京”,声称“首都的第一公园、莫愁湖公园、五洲公园,北平的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等,均于市民有良好的影响”<sup>[16]</sup>,此时与北京的公园并列的对象已不再是上海的外滩公园,而被替换为南京的公园,可见政治角色的变换导致其文化视线的转移。

自由主义文人游览上海公园的纪录甚少,偶见徐志摩在信中简单地提到了和朋友“同去兆丰公园坐咖啡”<sup>[17]</sup>的情形,而身在北京的自由主义文人却屡屡批评上海的公园,例如,陶孟和揭露上海租界内的公园对于华人的侮辱,声明“即使上海工部局未发布此项条文,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以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加以说明<sup>[18]</sup>。1930年5月的沈从文尚在上海,却在北京的杂志《燕大月刊》上调侃人们眼里所谓的“上海好处”,其中之一便是“洋场”中的公园,他说“到公园去,全是小洋团团的天下,白发黄毛,都很有趣味”<sup>[19]</sup>,而且三年之后,北京的中央公园水榭却成为他与张兆和宣布结婚的地方<sup>[20]</sup>。在中央公园同样的地点,还更早地留下过青年梁实秋的身影,他常常在那里等候他的恋人季淑<sup>[21]</sup>。两地公园,两种情感,谁能怀疑公园在研究文人心态方面的重要意义?

与自由主义文人接近的某些开明文人也不喜欢“洋场”社会,有人从北平、南京和上海的公园景象之比较当中发掘上海“洋场”特有的“不中不西不文不野”的文化特征:“在北平游中央公园或北海的游客,总是一个西式的佳人,尾随个翩翩公子,或是几个伴侣一般的走着。在南京逛玄武湖或鸡鸣寺的人们,亦复如是。而在上海光顾法国公园或其他公园,以及电影院的朋友,更是取一对一的政策:一个绿发修垂的、粉脸朱唇的、旗袍外套的、高跟丝袜的、花枝招展的、飘然欲仙的新女子,跟个油头粉面的‘上海化’的小白脸”<sup>[22]</sup>。“‘上海化’的小白脸”之谓和沈从文讥诮的“小洋团团”其实都表现了文人批评上海风气的姿态。

### 四、功能冲突:左翼文人与城市公园的复杂关系

文人岂有不爱自然美景的,左翼文人也概莫能

外。鲁迅曾经建议：“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sup>[23]</sup>。据考察，鲁迅“在北京住了那么些年，游踪所到，去公园的次数很多”，尤其是中央公园，鲁迅“每年天暖之后，都要到公园去几次”<sup>[24]</sup>，到了上海之后的鲁迅却很少逛公园，仅去过江湾路上的“六三花园”和昆山路上的“儿童公园”，主要因为他在上海的生存环境颇为险峻，文化活动又相当繁忙。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等创造社文人有时却趁闲暇之余到租界公园游览一番。郭沫若在1928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Anna原与仿吾约，午后游法国公园，但不幸雨竟日”<sup>[25]</sup>。虽然这则日记表明因天气关系，成仿吾等人在这一天未能去法国公园，但在此前或此后的时间里，他们极有可能去过法国公园。王映霞晚年回忆了她和郁达夫一道逛公园的情景：“愚园路尽头，便是兆丰公园（今名中山公园）。我们从车上下来，进了公园，一直缓步到公园的后门（曹家渡）出来。沿路的一花一草，一事一物，我总爱向郁达夫问个明白。他就像大人对孩子似地，不厌其烦地讲得很详细”<sup>[26]</sup>。看来郁达夫是兆丰公园的老游客。郑伯奇先后两次回忆了自己和郁达夫的公园经历，其中有两个疑点：一是他和王映霞所说的公园名称不一致，王映霞说郁达夫经常逛英租界的兆丰公园（极司非尔公园、梵王渡公园），而郑伯奇却说是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法国公园），他在1959年写道：“有时，当月朗风清的晚间，我们特地乘电车去逛‘顾家宅公园’。我们在绿茸茸的草地上，不着边际地漫谈起来”<sup>[27]</sup>。在1962年又回忆说：“当时，达夫正和王映霞恋爱，两人常常去‘顾家宅公园’密会。……我亲眼看见他沉醉于甜蜜生活的情景，更不便谈别的事了”<sup>[28]</sup>。在王、郑二人不同的叙述背后存在两种因素：一是两人当中有一位误记或误述了客观事实，二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当年既常到兆丰公园，也多往顾家宅公园，无论哪一种情况符合事实，都能说明郁达夫是一位非常热爱游览公园的文人。另一个疑点是：郑伯奇在1959年和1962年的前后两次叙述中对郁达夫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前一次他颇有诗意地描述自己和郁达夫两人坐在顾家宅公园的草地上“漫谈”的惬意，后一次却含蓄地批评了“沉醉于”个人感情中的郁达夫在公园中浪费了很多时间，表示自己那时候和郁达夫已经产生了思想的隔阂。为何在三年时间内，郑伯奇对昔日老友的同一行为竟然给出了不同的价值评判？线索也许隐含在郑伯奇的叙述时间上——1959年和1962年前后的中国文人处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中呢？那时候的政治气氛又如何？在特定历史

阶段，左翼文人的文化逻辑产生了冲突——他们虽然也喜欢城市公园之类的文化“乐园”，却又反对将“乐园”当成躲避时代风雨的“避难所”。

其他文人在公园里游山玩水、浅斟低唱之际，左翼文人却有可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秘密地接头或策划：“有时邀约几个人，在虹口公园的草地上开会”<sup>[29]</sup>；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联系，“常常是约定在邻近沪西的兆丰路终点的兆丰公园门口……准备好两个入门券（派斯）就走进公园去了，且谈且行，有时也找个僻静的地方坐坐，很方便的就把工作交代清楚了”<sup>[30]</sup>。有时也在“北四川路底的虹口公园”召开“小组会议”<sup>[31]</sup>。左翼文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特殊的会议地点，是“由于‘左联’没有办公地点和固定活动场所，大家只好利用公园、饭馆或其它公共场所开会，有时也在某一成员的住所里开”<sup>[32]</sup>，公园因而成为左翼文人聚议的天然会场之一。本雅明从烟雾弥漫的巴黎小酒馆里发现了密谋的文人，而中国的左翼文人有时却在阳光明媚的上海公园中开会策划！

尽管公园对于左翼文人来说意义重大，但是他们常常抨击与公园相关的社会状况。例如，郭沫若批判公园内的种族歧视现象：“西洋人的公园并不是没有，但那只是西洋孩子的乐园，看护西洋孩子的中国奶妈可以进去，中国人的孩子是绝对不能进去的”<sup>[33]</sup>。郑伯奇书写公园里的凶相：“虹口公园的广场，已经被着黄色白色短衫大裤的陆战队兵士站满了”<sup>[34]</sup>。刘一梦指出“在租界的公园，进去都是有条件的，至少得带点洋气才行”<sup>[35]</sup>。还有人以虹口公园为故事背景，突出富人、绅士与乞丐的生存现状的尖锐对比<sup>[36]</sup>。不可否认，左翼文人的笔下有时又会出现关于公园的含混叙述，例如王独清在诗歌中谴责“租界上的公园是不准华人涉足”，却又对公园充满了种种幻想：“公园中一定被浓厚的树荫填满，/……/一定有许多男女在穿着轻薄的衣衫，/都坐在那些长椅上安然地出神，休憩”<sup>[37]</sup>。话语的混杂和紊乱完全符合一个具有留洋背景却刚刚“左”转的创造社文人的文化心态。左翼文人思想转变的时间层次性甚至体现在一些著名的作品中，1927年的茅盾的《幻灭》与1930年的丁玲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对于公园的描写具有不同的色调，茅盾看到的公园景象是：“榆树的巨臂伸出在他们头顶，月光星光全都给遮住了，稍远，濛濛的夜气中，透露一闪一闪的光亮，那是被密重重的树叶遮隔了的园内的路灯。那边白茫茫的，是旺开的晚香玉，小池的水也反映出微弱的青光”<sup>[38]</sup>。而丁玲眼中的公园情状是：“园里人不多，几个西洋人，和几部小

儿车, 疏疏朗朗的散在四方。四方都是绿荫荫的, 参差着新萼的绿叶, 大块的蓝天静静的覆在上面, 有几团絮似的白云, 耀着刺目的阳光, 轻轻的袅着, 变幻着”<sup>[39]</sup>。公园景致在茅盾和丁玲的笔下之所以呈现出如此迥异的美学格调, 除了写作风格不同之外, 左翼作家在不同时段的思想情感基调暗中影响了其创作心态。1930年前后, 左翼文人的政治意识较为成熟了, 但是从某些左翼作家关于公园景观的勾勒和渲染当中, 依然能够找到一些驳杂的痕迹, 例如白莽在《小母亲》一文中首先描写公园里“高耸的大树, 鬼怪一般的伸上天空去, 铁青的天空, 只点缀了嘲弄似的几点星光, ……无尽的水波, 倒映着凌乱的灯影”, 随后又写道: “公园依然是那么静美的, 上海的夜依然是那么呻吟的, 乱水灯影依然是那么凄凉的, 一切都不会改变”<sup>[40]</sup>。险恶怪异的整体氛围之中依然存有幽微缥缈的成分, 说明左翼文人的公园体验确实含有冲突、矛盾的因素, 公园的多重功能造成了他们复杂的精神图景。

## 五、结语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 国内思潮却显得相当活跃, 一大批聚集在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中的文人在思想立场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他们的城市活动方式有所不同, 对于城市空间的精神体验也各有千秋。

本文具体考察了1930年前后的中国现代文人与城市公园的关系, 从中可以看出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人(通俗文学作家)等不同群体的文人的价值追求与活动规律, 即城市公园有可能被文人视为市民生活的权利载体、都市人休闲怡情的“乐园”、高雅之士聚议的文化场所、社会活动家隐身密谋的“避难所”, 当然, 城市公园的这些文化功能也有可能被文人加以综合利用。从这一个角度可以证明, 探究中国现代文人面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心理意识和文化逻辑, 有助于辨析特定时期的历史氛围和文化语境。

## 参考文献:

- [1][德]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论波德莱尔[M]. 张旭东, 文生.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 [2]郑振铎. 郑振铎文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3]大上海指南[M]. 上海: 东南文化服务社, 1947.
- [4]本埠新闻二·公共租界公园六月一日开放[J]. 申报,

1928-5-17.

- [5]上海通社. 上海研究资料[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83.
- [6]章衣萍. 衣萍书信[M]. 上海: 北新书局, 1933.
- [7]张若谷. 珈琲座谈[M]. 上海: 真美善书店, 1929: 25.
- [8]曾今可. 今可随笔[M]. 上海: 北新书局, 1933: 10.
- [9]曾今可. 颗星[M]. 上海: 新时代书局, 1933: 102.
- [10]曾今可. 落花[M]. 上海: 新时代书局, 1933: 92.
- [11]王曼云女士. 夏夜[J]. 紫罗兰, 1929, 4(7): 69-43.
- [12]刘一峰. 北京中山公园沧桑[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C].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6.
- [13]逯耀东. 胡适与当代史学家[M]. 台北: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8.
- [14]曹伯言. 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 [1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蔡元培全集(第4卷).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1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蔡元培全集(第7卷).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17]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第6卷).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 [18]陶孟和. 上海问题一致现代评论记者[J]. 现代评论, 1927, 6(135): 7-9.
- [19]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11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 [20]凌宇. 沈从文传[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
- [21]梁实秋. 槐园梦忆[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 [22]宁丽园. 谈上海[J]. 中学生 第期, 1930(6): 7-9.
- [23]鲁迅. 鲁迅全集(8)[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24]邓云乡. 鲁迅与北京风土[M].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 [25]郭沫若. 离沪之前[J]. 现代, 1933, 4(1): 11-13.
- [26]王映霞. 我与郁达夫[M]. 西安: 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8.
- [27]郑伯奇. 忆创造社[A]. 创造社资料[C].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 [28]郑伯奇. 沙上足迹[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29]艾芜. 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我参加左联前前后后的情形[A]. 左联回忆录[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30]马子华. 意气方遒[A]. 左联回忆录[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31]黄药眠. 黄药眠口述自传[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32]任钧. 关于‘左联’的一些情况[A]. 左联回忆录[M]. 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928, 1(9):2-10.

[33]郭沫若. 后悔[J]. 创造月刊, 1927, 1(6):2-10.

[38]茅盾. 幻灭[J]. 小说月报, 1927, 18(9):1-7.

[34]郑伯奇. 帝国的荣光[J]. 创造月刊, 1928, 2(1):8-10.

[39]丁玲.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J]. 说月报, 1930, 21(9):36-39.

[35]刘一梦. 沉醉的一夜[J]. 太阳月刊, 1928(1):1-6.

[36]菟尔. 践踏[J]. 拓荒者, 1930, 1(2):2-10.

[40]白莽. 小母亲[J]. 萌芽月刊, 1930, 1(4):1-4.

[37]王独清. 归来了, 我地故国! [J]. 创造月刊,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Modern Chinese literati and city parks (around 1930)

GAO X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55011, China)

**Abstract:** Around 1930, Chinese domestic ideas were very active.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i gathered in the city. They differed in cultural position and showed various ways of urban activities. Literati of the Left-wing, the liberalism, Shanghai literati (popular writers) and other scholars of different types formed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city parks respectively. will help to.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i' awareness of urban public space helps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atmosphere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at era.

**Keywords:** modern literati; city parks; ound 1930

(上接第41页)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重而道远。把握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紧跟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面对教育对象特征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高校要积极探索教育新思路、改革教育举措,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实现与时俱进,开创“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 参考文献:

- [1]张晓京,文书锋,金添.“90后”大学新生思想行为能力特点的调查[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9, 9(129):114-117.
- [2]湛红艳.“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途径[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0, 4(4):9-10.
- [3]段勇军. 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8(4):364-365.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after 90s” college students

CAI Jin-xia, WANG Xiao-m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after 90s” college students’ thinking, emotion, behavior, cognition, etc.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after 80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of “after 90s” college students,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 direction and strategies which go with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rul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ducational goal.

**Key words:** “After 90s”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alysis

作者: [高兴](#)  
作者单位: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曲靖, 655011](#)  
刊名: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年, 卷(期): 2012, 29(2)

## 参考文献(40条)

1. [本雅明; 张旭东; 文生](#)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论波德莱尔](#) 1989
2. [郑振铎](#) [郑振铎文集](#) 1985
3. [大上海指南](#) 1947
4. [本埠新闻二·公共租界公园六月一日开放](#) 1928
5. [上海通社](#) [上海研究资料](#) 1984
6. [章衣萍](#) [衣萍书信](#) 1933
7. [张若谷](#) [珈琲座谈](#) 1929
8. [曾今可](#) [今可随笔](#) 1933
9. [曾今可](#) [颗星](#) 1933
10. [曾今可](#) [落花](#) 1933
11. [王曼云](#) [夏夜](#) 1929(07)
12. [刘一峰](#) [北京中山公园沧桑](#) 1986
13. [逯耀东](#) [胡适与当代史学家](#) 1998
14. [曹伯言](#) [胡适日记全编](#) 2001
15.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 1997
16.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蔡元培全集](#) 1997
17.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 2005
18. [陶孟和](#) [上海问题一致现代评论记者](#) 1927(135)
19.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2002
20. [凌宇](#) [沈从文传](#) 2003
21. [梁实秋](#) [槐园梦忆](#) 1994
22. [宁丽园](#) [谈上海](#) 1930(06)
23. [鲁迅](#) [鲁迅全集\(8\)](#) 2005
24. [邓云乡](#) [鲁迅与北京风土](#) 1982
25. [郭沫若](#) [离沪之前](#) 1933(01)
26. [王映霞](#) [我与郁达夫](#) 1988
27. [郑伯奇](#) [忆创造社](#) 1985
28. [郑伯奇](#) [沙上足迹](#) 1999
29. [艾芜](#) [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我参加左联前前后后的情形](#) 1982
30. [马子华](#) [意气方遒](#) 1982
31. [黄药眠](#) [黄药眠口述自传](#) 2003
32. [任钧](#) [关于‘左联’的一些情况](#) 1982
33. [郭沫若](#) [后悔](#) 1927(06)
34. [郑伯奇](#) [帝国的荣光](#) 1928(01)
35. [刘一梦](#) [沉醉的一夜](#) 1928(01)
36. [苑尔](#) [践踏](#) 1930(02)

37. [王独清](#) [归来了,我地故国!](#) 1928(09)
38. [茅盾](#) [幻灭](#) 1927(09)
39. [丁玲](#) [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 1930(09)
40. [白莽](#) [小母亲](#) 1930(04)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bjzkjxyxb-shkx201202017.aspx](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bjzkjxyxb-shkx201202017.aspx)